

《史 記》

——殷、周、秦《本紀》新證圖補
商周史事新證圖補（壹）



天津大学青年教师培养基金(A类)资助项目成果

《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

(一)

殷、周、秦《本纪》新证图补

陈家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殷、周、秦《本纪》
新证图补. 1/陈家宁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201-07065-0

I. ①史… II. ①陈… III. ①史记—研究②中国历史—
商周时代—研究③中国历史—秦代—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112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同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4 37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300 千字

定价 40.00 元

内容提要

《史记》是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伟大著作，是中国历史学上的一座里程碑。历代研究《史记》者众多，使“史记学”成为一项专门学问。自清末甲骨文出土以来，众多出土文献层出不穷，给《史记》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即以出土文献为主要依据，对《史记》中殷、周、秦三篇《本纪》进行解释阐发。利用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玺印、陶文、石器和简牍帛书等资料，讨论商、周、秦三族的传说、来源、姓氏、祖先、世系、名臣、地望、诸侯国及相关史事等内容。多引证前人时贤的高论，参以己见。通过总结周代以来对商人尤其是纣王行迹的夸张歪曲，说明史书不能全信，必须经过可靠证据的检验；总结商周、蛮夷及其后秦晋等国间的征伐战争，说明由于所处的立场不同，同一类事件可以被定以截然相反的性质，自身的利益是其定性的根本依据。

序

刘 钊

在历代有关中国古典学的研究中,无数学者默默践履着以地下材料印证地上材料的法则,此即所谓“二重证据法”是也。但此法实非王国维先生所首创,惟于王氏之前有其实而无其名而已。王氏特将其揭示出,此法遂得命名,并借王氏大名而演化成学界共识,最终成为研究中国古典学的不二法门。后来附丽而出的“三重证据法”,或将出土文献分成文字的与器物图像的两类,或在地下地上文献外加上民族学的文献,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研究中国古典学的方法并无甚花样,主要还是实证的、考据的方法。学者间或空谈理论以讨巧,或搬弄概念以眩奇,皆非正途。正如裘锡圭先生所指出的,就目前的学术界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理论或方法,而是研究态度的问题。”(见《“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4期。)而谈到材料,则傅斯年先生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最好的导引,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陈家宁博士的大作《〈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可谓新时期用新证方法整理传世典籍的新收获。该课题本是一个系列研究,目前其完成的首卷(殷、周、秦《本纪》)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玺印、兵器、货币、石刻、陶文、简帛以及考古遗迹等,对《史记》中的殷、周、秦三篇《本纪》进行了新证,收集文献全面宏富,论证分析细密周详。这一“立体”的新证无疑会大

大促进关于《史记》和上古史的研究。

该书之所以从殷、周、秦三篇《本纪》入手，是因为古文字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可以用来新证这三篇《本纪》的数量较多，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接下来陈家宁博士将会在此书的基础上，进行《史记》其他篇目的新证研究。有本书的成功经验打底，《史记》全书新证的成功也当可预期。其实不仅《史记》，全部二十四史都可以进行新证。这也应是今后历史文献学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当然由于出土文献特点的不同，上古史和中古史的新证在具体操作上可能各有侧重，但方法论则是相通的。

该书的“新证”，绝非将出土文献简单地罗列、机械地排比，而是揉进了作者自己的许多观点和观念。其中有些观点和观念很有启发性，在此不敷一一举出细节，读者可以自行检阅。

中国古代的书原本很多都是配图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古人懂得图画比文字更直观、更形象，更让人记忆深刻。出土实物表明，当时不仅帛书如此，就连竹木简牍上，也常常见有各种图画。把相连的画有图画的简相拼，图画的真貌就会如实显现。像战国时代长沙楚帛书那样“图文并茂”的书，在当时应该是很常见的。如今的图书市场再次进入“读图时代”，但这却不能算是创新，而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回归”。陈家宁博士该书的标题之所以有“图补”二字，就是想发掘发扬古人这一传统，充分运用图画的辅助功能，让其在新证中发挥更大的效用。从结果来看，这一做法是非常成功的。

该书作者陈家宁原是我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博士，他天资聪颖，勤勉于学，加之热情开朗，乐善好施，故所到之处，皆能与人相处融洽，让人喜爱。他博士毕业时我曾想将其留在身边，但他耽念故乡，侍亲至孝，不愿离开父母左右，所以最终还是回到老家的天津大学工作。这于我不免遗憾，对他却是适得其所。

值此《〈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首卷即将付梓之际，蒙家宁

厚爱，嘱我在书前作序。以我的学问本无资格，但念我们师生之谊，且该书题目也是我为他定的，故不畏冒“佛头着粪”之讥，在此说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话，聊以塞责。是为序。

2011年5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凡 例

1. 本书按《史记》原文顺序排列，凡与新证内容关系不大的原文不写出，用省略号表示。

2. 行文中引用《史记》原文的内容，出处不标“史记”二字，仅称篇名，如《史记·商君列传》称作《商君列传》。

3. 几种常见的《史记》注本用简称，如：

裴骃《〈史记〉集解》——《集解》

司马贞《〈史记〉索隐》——《索隐》

张守节《〈史记〉正义》——《正义》

梁玉绳《〈史记〉志疑》——《志疑》

泂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会考》

陈直《〈史记〉新证》——《新证》

韩兆琦《〈史记〉笺证》——《笺证》

4. 古文字著录书籍用简称，如：

郭沫若等《甲骨文合集》——《合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屯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花东》

曹玮《周原甲骨文》——《周原》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三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集成》

2 《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

罗福颐《古玺汇编》——《玺汇》

庄新兴《战国玺印分域编》——《玺域》

傅嘉仪《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秦印》

周晓陆等《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发现》

罗福颐《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征存》——《征存》

高明《古陶文汇编》——《陶汇》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博二》(它册同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

5. 引用常见的典籍统一在文末参考文献中标明版本,正文不出注。

6. 为方便打印、减少造字,在不影响含义的情况下,引用古文字材料原文尽量用宽式隶定,或径写出假借本字。

7. 为省篇幅,行文径称学者名讳,敬请谅解。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序	(1)
凡例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引 言	(1)
第二节 《史记》及新证研究	(14)
第三节 关于本书	(22)
第二章 《殷本纪》新证	(25)
第一节 小 引	(25)
第二节 商族先世	(32)
第三节 先王中期	(85)
第四节 先王后期	(93)
第五节 殷商前期	(112)
第六节 殷商后期	(123)
第七节 小 结	(140)
第三章 《周本纪》新证	(144)
第一节 小 引	(144)
第二节 姬周先世	(149)
第三节 武王克商	(187)

2 《史记》商周史事新证图补

第四节 西周世系	(213)
第五节 春秋世系	(250)
第六节 战国世系	(259)
第七节 小 结	(276)
第四章 《秦本纪》新证	(279)
第一节 小 引	(279)
第二节 嬴秦先世	(284)
第三节 春秋前期	(294)
第四节 春秋中期	(308)
第五节 春秋战国之际	(319)
第六节 战国中期	(335)
第七节 战国至秦	(376)
第八节 余 论	(422)
主要参考文献	(426)
传世典籍	(426)
著 作	(427)
论文(集)	(433)
致 谢	(44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引言

1. 史料、史书与《史记》

中国的史书在全世界是最丰富的,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可谓“史料大国”。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来讲,当然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有关中国历史的童年——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却并不尽如人意。《论语·八佾》记载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就曾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所谓言礼,其实就是透过“礼”来研究古代的历史制度,和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很相似,而他当年的感慨也正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古史研究者们共同的心声:史料所存在的问题是在研究先秦史时令学者们最感头痛的事。

作为中华文明发展早期的先民,其自身尚没有完全脱离蒙昧时期残留的意识。虽然中国的史官制度出现得很早,但最初的官方史官往往由瞽史、巫者兼任,其记载历史方法的科学性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显得极不成熟。他们口中的历史“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①,这就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判断的巨大困难。比如本书所论,无论

^①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2002年,第8—9页。

商、周，还是秦，在讲到本族始祖的时候都追溯到了一位伟大的女性，而这位女性始祖都是通过与神灵的接触而感孕生子，从而繁衍出一个部族。用理性的眼光来看，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及隐藏的真相，不同的史家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文字产生之后，便出现了正式的史官。王国维称：“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①他们终身以此为业，职位往往世袭，且有的在改朝换代之后，仍居是官。《吕氏春秋·先识》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夏商之史官执图法而奔至新王朝，就受到新君的欢迎，也定会为新王朝服务。但夏、商时期史册的原始面貌早已不为人所知，它们的内容可能间接地流传到了《竹书纪年》、《世本》之类的后世史书之中。经历了辗转传抄、引述之后，其内容恐怕早已面目全非。这也是同一件史事在不同的史籍中说法不一的原因之一。

历史的发展有其时序性和连贯性，后一个朝代往往会在制度上对前面的朝代有所继承。这就为后人研究前代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后世为出发点，通过联系史料记载，与前世相比较，弄清了它们之间的不同，就理解了前世的状态。在这方面，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便是一篇典范之作。而据《论语·为政》载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见孔子探究夏商之礼，所用的也是比较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朝代的历史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后人所遗忘、讹传或曲解。比如太伯、仲雍奔吴是西周建国前夕的一件大事，与吴国来源、周吴关系等问题密切相关，本应被牢牢地记载在史

① 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3页。

册上。但仅仅过了几百年,春秋时代的史书对其事就已经含糊其词、语焉不详了。

此外,由于部族、种姓甚或阶级之间的利益差别,有些前世灭亡国家的史实到了后世取而代之者的说法中,会被故意隐瞒或歪曲。白寿彝称:“改朝换代了,回护本朝的短和夸大前朝的罪恶和错误,这就成了新修史书的一个政治任务。”^①《秦始皇本纪》载秦初并天下后命议帝号的诏文中历数韩、赵、代、魏、荆、燕、齐国诸王的罪过,将他们都说明成是多行不义,自取灭亡,实属恶人先告状。由此推想《尚书》中所谓“周初八诰”之文,若说其责罚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恐怕也不能令人相信。其实这类情况不仅在《史记》所载的时代俯拾即是,即便在后世也不乏其例。翦伯赞曰:“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见到的历史都经过了他人主观意识的加工和改造。但无论多么精明、严谨的改造者都无法做到天衣无缝、面面俱到。造成的结果就是,当各种真伪混杂的史料一股脑地摆在史学家面前时,即令伟大如司马迁也很难慧眼参透,往往只能择善而从或诸说并存。这就使得“历史”被越写越厚。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了中国古史”学说^③,认为传统观念中的古史系统是经过周汉以来众多学者不断增益而成的。在他们的意识中,随着这个增益的过程,对历史的解释变得越来越“完满”,历史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从本质上讲,我们所做的工作性质与前人并无差别。也就是说,当我们无从判断一件事或一个说法时,得到关于它更多的信息无疑将帮助我们进行合理的

①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

② 翦伯赞:《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③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

研究和推测。这种信息也许来源于故纸堆(传世文献),也许来源于古代遗物(出土文献)。但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人们主观条件上的充分准备,要有打破成说的勇气和鉴别史料的能力。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则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两者说法相反,但都说明了古代史官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王者的言行。现存上古记言之史书除《尚书》外,还有《逸周书》及国别史《国语》、《战国策》等,记事之史书除编年史《春秋》、《左传》外,还有《竹书纪年》和《世本》的辑本等。这些典籍所记载的内容在后世书籍中屡被称引,成为研究古史的必备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逸周书》和《竹书纪年》是由出土文献转化而来的传世文献,其对中国古史学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可贵之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将他当时所得到的史料贯穿起来,融为一体,成为不朽之作。从体例上说,“本纪”和“世家”都脱胎于《左传》一类的编年体史书,只是以国姓族氏为中心;又“仿周代谱牒的体制,编成《三代世表》等十篇”^①;《史记》中的“书”,在《汉书》及以后的正史中称为“志”,“溯其根源,实渊源于古代记事之史”^②。《后汉书·班彪传》载其《〈汉书〉略论》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略数《史记》所用之史料。除此之外,《世本》也是重要的一种^③,为《史记》所述先秦

① 王伯祥:《〈史记〉选·序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② 王树民:《释“志”》,《文史》(第三十二辑),中华书局,2006年,第313—317页。

③ 参见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世系搭好了框架。另如在《殷本纪》中，太史公亦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其他诸如秦史记、诸子书、功令、官书、方士言等史料太史公也都加以利用。

梁启超曰：“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①如《太史公自序》称其“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另于诸篇之中多述其所到之处，可见太史公在尽可能全面搜集文献资料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问。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都是科学的。

太史公于《六国年表》序中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感叹六国史记之不存。至《汉书·刘歆传》载：“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虽有古文经出土，可惜其学至西汉末年方兴，太史公未见其书。《晋书·束皙传》亦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詮次。”诸如此类重要的史料太史公也没有见到。

总之，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史记》给后人留下了颇

①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梁启超全集》（第十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628页。

多疑难问题,但应该说太史公在史料利用上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当我们面对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新史料而感慨时,只有也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好这些疑难问题,才无愧于太史公为中华民族留下的这部伟大著作。

2. 相关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

本书所用的是广义的“出土文献”^①,“泛指古代遗留下来和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牍帛书等文字资料及各种图像资料”^②。上文所述的孔宅古文和汲冢竹书就属其中,从载体材质上讲,还包括石器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砖陶文字以及漆器文字等类。在汉晋前后,经过几百年间学者们的努力,完成了秦始皇焚书之后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十三经注疏》中所收录的汉晋古注对这两批出土文献就曾加以利用。^③随着出土铜器的日益增多,宋、清以来兴起的金石学更使铜器铭文逐渐为众多学者所重视,金文在古史研究中也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宋代人在考释金文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与典籍相互印证,如叔液鼎(《集成》2669)之“鬯寿”,薛尚功径释作“眉寿”^④,以为即《诗·豳风·七月》之“眉寿”,至今为不刊之论。从宋代到清代中叶,学者常以治经学为考释金文的目的,至阮元认为金文“其重与九经同

① 李学勤界定曰:“广义的‘出土文献’覆盖面很广,连甲骨文、金文等都包括在内……狭义的‘出土文献’,主要指地下发现的古代书籍,具体讲即简帛佚书之类。”见《出土佚书的三点贡献》,《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8月。

② 刘钊:《谈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223页。

③ 参见刘钊、陈家宁:《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8页。

④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华书局,1986年,第85页。